



沉心静气淬砺 不负时代奉献

——评《滨州通史》，一部地方通史的精品力作

李楠

己亥新春，有幸读到李象润先生等主编的《滨州通史》，是201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的，我国已故著名史学大家李学勤、安作璋为学术顾问并作序，既有辞章精又有书法美，展读墨香感触良多。编著地方史，根本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古今用充分彰显我国文化自信力的地方板块。《滨州通史》是一部系统反映滨州历史发展轨迹，展现滨州历史文化特色的学术巨著。该著采取通纪、典志、人物相结合的记述方式，全面记述了滨州地区的文明演进历程，2017年9月《滨州通史》团队推出的《滨州十大历史名人》海盐艺术荣获山东省第十届泰山文艺奖一等奖，2018年6月《滨州通史》荣获山东省历史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不但填补了滨州没有通史的历史文化空白，而且开辟我国地方通史编纂的新路径，充分展现了立大德、接地气、出精品、出人才的学术勇气。

细读《滨州通史》，不但内容丰富详实周全，而且体例完备又具艺术之美，颇多干货。全书分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金元卷、明清卷、民国卷，涉及从先秦至民国时期滨州市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思想、文化、宗教、教育、科技、风俗、文物、文学、艺术、社会、人物等诸多方面，凡历史时

期有特点、有影响、有贡献者，均辑录其中。可以说，该著内容之丰富，资料之充盈，堪称滨州历史文化之集大成者。该书继承了中国古代正史编纂的传统，以纪、志、传为主要书写形式，尽展滨州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弘毅进程，细数了滨州社会形态的历次变迁，生动地呈现了滨州历史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重要典章制度和重要历史人物，囊括了滨州历代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的历史，以简朴的文风再现了滨州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展示了滨州大河入海的优秀地域文化之特点。

滨州历史文化悠久，是齐文化和黄河文化的发祥地。滨州大地上形成的农耕文明和河海文明交汇的特色文化，在历史上先后出现多次繁荣，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滨州通史》借助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成果、民间传说、馆藏文物等史料，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高度来梳理从史前文明到新中国8000余年的滨州历史，为我们厘清了滨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总的来看，《滨州通史》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两大创见：一是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二是作为对滨州历史的第一次系统学术梳理和著述，《滨州通史》的

编著工作带有许多开拓性和探索性。

一、《滨州通史》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在中华民族历史“东西交济”“自北至南”发展进程中，滨州始终处于历史的制高点和交汇处。史学泰斗李学勤曾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姜太公建立齐国是从中原地区，顺流而下，在济水下流，今黄河两岸的滨城、博兴一带建国的可能性最大，而从陆路到临淄直接去建国的可能性极小。”该书经过梳理研究提出，姜太公建立齐国的起始点选在位于古济水下游的薄姑故地，即今滨州的博兴、滨城一带建都立国(营丘之地)。所以，滨州一带遂成为齐国文化最早的发祥地。

随着商王朝的东进，至少到商朝晚期，山东北部滨州境内便形成了三条横贯中原与海岱地区的东西交通大道，滨州也成为这三条“东西古道”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古黄河及古济河作为贯通东西的两条主河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作用。两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流经滨州境内，形成南济北黄的格局。黄河下游与济水下游流域，是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京津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最早融入中原文化的区域。这两条水路也相应成为商人东进的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也是商代晚期商人控制滨州一带

海盐资源的重要运输通道，进而使河济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商王朝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发展成为商王朝最稳定的大后方。

至少到商代晚期，在河济古道的南边，鲁中山区的北麓，开始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原与海岱之间的东西陆路交通大道。东西陆路古道在今滨州南部的邹平礼参、长山等地经过，与现在的胶济铁路线基本平行，略微靠北。滨州邹平正处于这条“东西古道”的中心位置。齐国建都临淄之后，这条位于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古道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周王朝控制山东地区的主要经济、文化、交通干道，也成为齐国从中原通向半岛的主要军事交通线。此外，从中国古史经济中心由北而南的转移过程中，包括时至今日东部沿海隆起的新时代表，滨州始终处于中国“南北干道”的交汇处。

除了上述两大创见，《滨州通史》还梳理总结了一系列大家关心或颇为疑惑的学术问题，诸如滨州先民的开拓、大禹在滨州治水、东夷万国、滨州的行政区划成型、明代移民迁入滨州的方式以及清代滨州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该书也作出了详细的梳理和考证，编者过程实属一项“傻子”的事业。

二、《滨州通史》是第一有关滨州历史的通史性著作，是滨州历史研究史上的一项里程碑式成果。滨州位于我国古代“东西古道”与现代中国“南北干道”的交汇处，作为对滨州历史的第一次系统的学术梳理和著述，《滨州通史》的编著工作带有开拓性和探索性。

该书在体例上博采众家之长，同时更注重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研究、记载相关问题，既实现了各卷内容的有机统一，又兼顾到了各时代内容的多样性。在编纂过程中，贯穿了通史性著作的编纂理念，尽可能地将对相关史实介绍清楚、全面。同时，又展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相关成果，将作者对有关问题的思考融入其中。

李学勤教授认为，“《滨州通史》和区域通史的编纂暨地域文化研究的创新成果和成功模式”，走在全国地市级的前列。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教授也给予充分肯定。《滨州通史》的编纂是用中国史学理论解读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功范例，为基于齐鲁文化和地方史的文化自信开拓了活水源泉，为发扬光大齐文化提供强大的历史动力和精神激励。

(作者单位: 山东社会科学院)

明朝吏部尚书杨巍曾立下“四不”廉洁遗嘱

张海鹰

四百多年前，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其遗嘱里明确规定了自己死后不乞恩典、不要祭文、不受牲祭、不列冥器，这“四不”遗嘱，堪称一篇廉洁的遗嘱，读之令人动容、令人钦佩，令人景仰。这位老人便是明朝无棣籍一品大员、赐进士第、荣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杨巍。

杨巍(1517-1608)，字伯谦，号二山，又号梦山，明朝山东济南府武定州海丰县尚义里村(今滨州市无棣县杨三里村)人，历官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工部、户部、吏部尚书。

万历皇帝长子明光宗朱常洛追忆先朝旧臣杨巍，恩荫其长曾孙杨锡侯选中书舍人。

杨巍，“关心民瘼，仁孝播扬朝野”“忠君体国，勋业有口皆碑”。杨巍生前获得很多荣誉，四世受朝廷恩典，其镇抚山西、陕西二省历时十三年，因军功政绩卓著，得以五次徙官，四次赏金、二次加俸，万历皇帝的父亲、明穆宗朱载堉赞曰：“巍自为藩以来，扬历数镇，控制数千里，当兵革胶葛之冲，未尝失败。”杨巍六十九岁时，晋爵太子太保，谥号山东海丰城里十字街北及各省省会建“大家宰坊”；七十四岁，四十余次上疏恳请得告老归故里，万历皇帝百般不舍，特颁赐给杨巍羊酒、夫米及新钞三千贯，特赠杨巍曾祖、祖、父为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曾祖母、祖母、母均赠一品夫人，赐建“三世褒德坊”“姑妇双贞坊”；九十岁时，皇上特旨慰问，并晋阶其为“柱国公”；九十二岁时，皇上钦赐其“天下尊”之匾额，并遣刑部贵州司主事何廷魁奉旨到海丰，派夫匠二百名，赐纹银五百两，依式督理为杨巍及其已逝两位夫人造坟开葬，可谓礼极矣。

不乞恩典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某日，九十二岁的杨巍预感不久将离世，便立下遗嘱，自谦道“我无功德”，死后不许子孙向朝廷“乞恩典、请谥号”。

杨巍一生宦游南北四十余载，忠君爱国，仁德清廉，文韬武略，朝野相颂，被誉为“江南第一令”“右臂长城”。

就在杨巍立下遗嘱不久的十一月三十日，杨巍去世。万历皇帝特谥山东海丰、江苏武进及山西全省将其崇祀忠孝祠、乡贤祠、名宦祠，各省省会俱建“官保太宰坊”，海丰建杨巍祠。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杨巍下葬之时，山东省布政使司具题，礼部奏请，万历皇帝痛其亡，赐谥为杨巍祭九坛，为杨巍的已逝两位夫人(原配陈氏、继配马氏)祭一坛，并遣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带管分守济南道右参议兼按察使司司事张五典至海丰致祭。天子嗟悼，恤禄加等，追赠杨巍为“少保”，荫其长孙杨去疵候补中书舍人。十年后的明泰昌元年(1620年)，万

不要祭文

杨巍在遗嘱里特别交待子孙：“不要祭文，至于祭轴尤所厌恶”。

杨巍，“和谐为宗，德望显于朝廷”，他虽不要祭文，但是万历皇帝还是为其谕祭文《祭上柱国、少保梦山公文》，对其品德、政绩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明赐进士第、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叶向高、陕西太仆寺少卿邢侗、工部尚书刘元霖先后为杨巍撰《墓志铭》、《行状》和《神道碑》。

杨巍“七七”时，万历皇帝念其品行，特钦颁谕祭文《祭上柱国、少保梦山公文》七道，首七文云：“惟卿望重天，卿位隆官保，绩丕彰于中外，行益表于乡闾。言念沦亡，届兹首七，载颁祭奠，尚克祗承。”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入关以来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顺治为杨巍御制祭文：“惟卿德懋仁孝，助著安攘。佑护后人，斗山是仰。”顺治皇帝评价前朝旧臣杨巍，德行勉力，仁爱孝顺，功勋卓著，安内攘外，并将其喻为北斗和泰山，谓其德高望重、成就卓越，令后人所敬仰。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不受牲祭

杨巍在其遗嘱里写道：“诸亲不受猪羊祭。”“以后子孙上坟，只用茶果，不用酒肉、纸扎，以见平生为人。”

杨巍，“清介守身，廉洁堪称楷模”。杨巍说，自己“平身不爱钱”。俗话说得好，“三年知县事，十万雪花银”。杨巍在武进任知县三年，离任时两手空空。在吏部七年余，领衔百官，重权在握，仅存俸银五百两，退休回无棣时，只有二鹤一鹿一僧一道相随，行李也只有书籍一囊，人皆敬慕其清廉，以为“二疏”(指汉宣帝时名臣疏广与其侄侄疏受)之再见也。杨巍的俸银都哪去了呢？除本家族的日常开支外，大部分钱粮都用于为家乡及父老乡亲捐良田、置义田、建义学，修桥补路、无桥设舟，病者医药，亡者棺槨，施两餐不继者衣粮，助冠婚丧葬无力举行者财资及修庙补宇、施灯油香火资等。

虽说杨巍不受诸亲的猪羊祭，可是万历皇帝却不干，他在钦谕祭文时，还赏赐给杨巍丰

厚的祭品：猪一口、羊一腔、馒头五份、粉汤五份、果子五色、按酒五盘、炸骨一块、炸鱼一尾、酥饼四个、酥灯四个、鸡汤一份、鱼汤一份、烛一对、酒两瓶、风鸡一只、降真香一柱及焚祝纸一百张。另外，在钦谕《祭上柱国、少保梦山公文》和《祭上柱国、少保梦山公文》时赏赐的祭品一模一样。这样一来，赏赐给杨巍祭品的次数多达9次，可见万历皇帝对杨巍的厚爱。

杨巍过世九年后的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万历皇帝还赐杨巍以“少宰”，遣海丰地方官春秋特祭。旧时，以羊、猪二牲牲祭称“少宰”。杨巍过世三十八年后的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世祖顺治皇帝评价杨巍“前代功臣，助劳茂著”，并“赐以‘少宰’，著本籍地方官春秋致祭”。

不列冥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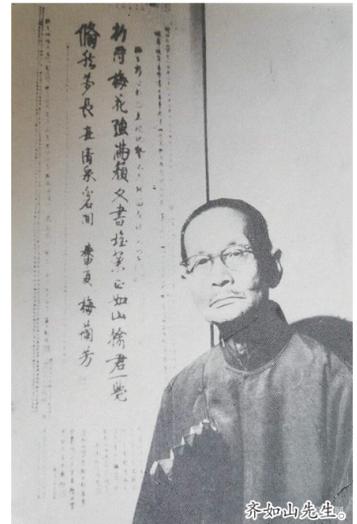
杨巍在其遗嘱里要求其坟前“不许列冥器”，只立石道人一对、两石僧对坐看经而已，出丧时用以遮蔽棺柩之物的棺罩“只用银五钱”，“不用纸扎”，只用“各色幡四十对、马一匹、轿一乘、书柜一桌、手卷柜一桌”，“平生爱树，坟至槐棚，每边栽马尾松五株”。

杨巍不爱钱，却爱树，他生前在故里，荒岭辟园，广植桃李。桃花岭是杨巍奉母天年，修心养性的世外桃源，也是他与文朋诗友饮酒品茗、吟诗作赋的洞天福地。杨巍不仅清操长厚、名重朝野，且才思敏捷、文采飞扬，仅传世诗作就近千首。昔时，桃花岭有杨巍书斋一处，曰“藜苜居”，杨巍在此处闲居二十载，辑著有《桃花岭诗集》《归桃花岭诗集》《存家诗稿》《续存家诗稿》等，部分



诗稿被收入《四库全书》，该书对其诗之评论为：“盖其中岁学诗，与唐高适相类，而天分超卓，自然拔俗，故能不染尘埃，独发清音。”杨巍不论是在四海为官还是隐退乡里时，都严格要求杨氏子孙要清白做人，安守本分，耕耘稼穡，读书取仕。据《杨氏家乘》记载，杨巍科进士后，开启了无棣“海丰杨氏”科贡举仕之盛况。杨氏一门，有进士2人(杨巍和杨巍九世孙杨刚)、文武举人13人、贡生(监生、太学生)67人；一品官4人、二品官4人、三品官6人、四品官8人、五品官以下者42人。由此，杨氏族望盛于明清两朝长达400余年之久，实为无棣乃至鲁北津南之望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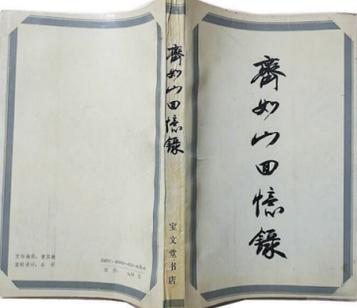
搜书志



邱如白先生

“说到我帮梅兰芳的忙这一层，虽然不敢说全国皆知，但知道的人确是很多。说真的，实实在在我也帮了他二十多年，可以说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一直到他搬到上海去住才算停止。这是不错的。但所以帮他忙之动机，的确是有的编戏”。

这是《齐如山回忆录》第六章“编戏”的头一段话。齐如山先生(1875-1962)出身高阳名门望族，他的祖父是仪阮元的门生——阮元是清朝乾隆的进士、嘉庆的巡抚、道光



督，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号称“三朝元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被道光皇帝赞为“完人”，他的父亲则是常熟俞同龢的门生。齐先生幼承庭训，博习经史，19岁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后经商，几次去西欧各国游历。他一生研究甚勤，著述颇丰。这本回忆录记述了他的家世、童年生活、求学生涯、研究戏曲的经历以及北京的风土人情。尤其是书中叙述他穷尽毕生心力使从来被视为“小道”的戏曲研究跻身于学术“大道”之林，

好一个“邱如白”

——齐氏后人题赠梅家后人的《齐如山回忆录》

钱杰

并协助梅兰芳创立京剧梅派艺术且在国际产生重大影响，诸多一手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在台湾政界和文化界闻人张其均为其撰写的《代序》中，我们还看到一个铁血革命党人齐如山的形象——他竟然是辛亥革命义后刺杀满清贵族顽固派、宗社党首领、革命党死敌良弼一案的重要参与者彭家珍烈士与良弼同归于尽的那颗炸弹，之前就放在齐家的商号“义兴局”里。炸死良弼，震动朝野，“谁敢阻挠革命就炸死谁”的暴力口号一时风行北京，也吓破了袁世凯的胆，南北和议、民国肇造遂得以顺利实现，这颗炸弹厥功至伟。张其均在序言中给予齐如山很高的评价：“齐氏不避身家性命的危险，毅然在禁卫森严的首都，利用自己所经营的商店作为革命活动的中心，这决不是一般人所能做、所敢做的事情。”自然，我们看到这里，也感到大大颠覆了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以齐如山为原型)那副神经兮兮的书生和经纪人的印象。

笔者收藏的这本《齐如山回忆录》为宝文堂书店1989年北京一版一印，扉页有齐熙、齐香兄妹赠梅绍武、屠珍夫妇的亲笔签名。齐熙(1909-1995)是齐如山的长子，曾

任台湾造船公司总工程师。1947年，齐如山在上海与梅兰芳见了最后一面并作长谈，于1948年底到台湾后，就住在齐熙家中。齐熙是比齐熙小两岁的妹妹。1947年从法国留学回到大陆，历任南开、清华、北大教授。梅绍武先生(1928-2005)是梅兰芳大师的次子，原名梅葆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英美文学翻译家、评论家、戏剧家和作家。妻子屠珍教授也是著名翻译家。齐、梅两家的通家世交之谊，是毋庸置疑的。而从这本书扉页题赠签名的口气来看，像是齐香教授的墨宝。

出版方北京宝文堂书店是个老字号，创办于清道光年间，开始是个印刷、售卖账本的账簿铺，同治四年(1865年)改营图书，成为宝文堂书铺，主要编辑出版老百姓爱看的通俗读物及历史书。1954年，该书店公私合营，归属通俗文艺出版社，受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1980年代初，恢复“宝文堂书店”名称，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下属的国营出版机构——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副牌，为曲艺作品、曲艺理论专著出版作出了贡献。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学生可能对宝文堂书店印象最深的就是金庸小说了。后来知道，宝文堂先后出的《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鹿

鼎记》并没有得到金庸的授权，那时我们的版权意识都很淡薄。但宝文堂的书印得是真精美，这家书店的番号于1991年被撤销。

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齐如山先生得享高寿，这可能与他关心时局却又远离官场、治学做事严谨而又不乏洒脱幽默有关。他在“回忆录”的最后说，有人觉得他还可以接着写下去，但他觉得台湾“天气很热”，不愿意再写了，便用一个笑话收尾：

说从前有位大官的爸爸已经八九十岁，但还没活够，便重金礼聘一位算命先生来，算他还能活多久。算命的怕他，但是怕他当官的儿子，便瞎扯说他能活一百四十几。老太爷很高兴，问在这几十年内有无灾难。这缺德算命的干脆骗人骗到底，说您一切平安，但要注意，在一百一十岁那年夏天，怕要患一次腹泻。老太爷赶紧嘱咐他儿子，你们记住啊，到那一年千万不要给我生冷的东西吃。

齐先生笑曰：“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过了一百一十岁腹疾之后，再接着写。请诸君耐心等待，一定看得见的。这话的意思，就是祝诸君长寿。”